

江有潮头水有源

说来有意思，此次由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组团赴巴西参加国际交流演出的号子队，却并非出自上海港，而是隶属于塘桥民间艺术团。塘桥与上海港码头号子有何关系？原来这个“码头号子”是上海港的“遗腹子”，后来成了塘桥社区认领的“养子”。

说来话长了。那是1971年秋季，位于浦东塘桥路的煤炭装卸专业码头上海港七区举行迎国庆文艺汇演，装卸一队爆发了个冷门，唱起了上海港的绝响——码头号子。6位“老三届”的“小码子”，把老工人在旧社会扛包挑煤时呼叫的几种号子串起来清唱一遍。虽然整个演出只有几分钟，却引得全场掌声雷动。

表演码头号子，其实是这些“小码子”的学习成果。上世纪60年代初，上海之春音乐舞蹈汇演曾邀请上海港的老工人组团清唱码头号子，并录制了唱片。从此，上港七区的码头广播站几乎每天要放几遍码头号子。装卸一队二班的“小码子”蔡盛和特别喜欢听，在他的提议下，几个“小码子”借出广播站的唱片，下班之后一起学唱排练起来。继承老工人的优良传统，这倒也算一项。

“小码子”的演出引起关注。不久，我接到港区指派的任務——整理码头号子。那时我也是上港七区装卸六队的“小码子”，一个在报刊上发表过几首诗歌的文学青年。于是，我开始追寻上海港码头号子源远流长的历史。

我走进了位于高阳路上港五区55仓库二楼的上海港港史展览会。

隋朝初年，上海出现第一个市镇——华亭镇（今松江区域），标志着上海地区港口的形成。大约清康熙年间，上海港出现了专门从事码头装卸的“脚夫”，按其搬运方式分为“扛夫”与“箩夫”。“脚夫”大都是周围市镇的一些贫民，手拉肩扛时为了减压呼叫的“嗨哟嗨哟”，虽然单调，却是上海港最原始的码头号子。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至1931年，上海港船舶进出口吨位已居世界第7位，成为远东航运中心。抗日战争前后，江苏、湖北一带灾荒连年，战火蔓延，避灾逃难的农民潮涌上海滩。不少农民工到码头扛大包维持生计。他们一天装卸作业满身臭汗，被贬称为“臭苦力”。

大量外来劳力进入上海港码头后，为维护自己可怜的生存，各地苦力结成帮派，集体作业。因为在超负荷肩扛手抬的装卸劳动中都要喊号子，又因各地乡音与装卸方式的不同，便形成了长江号子、苏北号子、连云港号子、湖北号子与扛棒号子、挑担号子、起舱号子、堆装号子、搭肩号子等极其丰富、渐显音乐性的号子荟萃。码头号子是上海港码头工人艰辛劳作的“历史录音”。

当时，我走访了一批“老码子”，其中，颇有几位人高马大、声音宏亮的“号子歌手”。后港区决定从各个部门挑选一批在旧社会喊过号子的“老码子”，与装卸一队二班的“小码子”一起“整编”，组建成上港七区码头号子队。

然而，使我为难的是，当时上级要求改编的码头号子不仅要“忆苦”，还要“思甜”，原生态的码头号子悲愤、凝重的情绪显然无法胜任这个新要求。怎么办？我束手无策。

飞过神秘的亚马孙河，回荡在马托格罗索州上空，令弗朗明戈的舞者无不动容，连连惊呼“太震撼了”……2012年，上海港码头号子环宇穿越，也牵引我的思绪在时光隧道中穿越……

黄浦江上好声音

◆ 烁渊

越江飘来“两朵花”

当时上海市群众文艺小组办公室指派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的指挥家黄佩勤先生与上海人民评弹团的赵开生先生到港区与我合作。黄佩勤是几艺誉满剧坛的《马兰花》的乐队指挥，赵开生则是脍炙人口的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的作曲。黄先生擅长作曲并熟悉歌舞艺术，赵先生熟悉戏曲艺术，他们俩“珠联璧合”，以我的新编唱本为依据，运用淮剧等地方戏曲音乐素材改编码头号子，增设了低吟浅唱，委婉、深沉的乐段，使那些原来高亢的号子在表现新中国码头工人豪情壮志的同时也糅进明快的音乐色彩，使其挺拔而又嘹亮。这样，低沉与挺拔、凝重与明快、暗淡与嘹亮，形成了新旧两个社会环境的鲜明对比，就像大潮有了波峰浪谷的跌宕，造就了澎湃的艺术力量。改编的号子有了主题旋律的贯穿，更显性格化、剧情化、程式化，也就具备了舞台艺术的作品形态。

越江（两位从浦西到浦东）飘来的“两朵花”，使码头号子“锦上添花”，产生了新的艺术魅力。从此，码头号子有了乐队伴奏与无伴奏两个演出的版本。上海市群众文艺小组办公室还派来一位舞蹈编导金国华，为号子队设计了舞蹈动作。

但这下却苦了那些“老码子”，他们手脚僵硬难以手舞足蹈，且改编的号子有乐谱并编配了伴奏，不识字的“老码子”更不识谱，而不识谱定然难记谱，于是全靠“小码子”一句句教。起先是“老码子”教“小码子”唱码头号子，现在“小码子”倒过来做“师傅”了。

在4年多的时间里，我作为这个号子队的编创与领队，率队应邀走遍上海，到各处演出。每场演出，码头号子都是独领风骚的压轴戏。常常，在“大小码子”的“哎唷里，哎唷拉”声中，全场观众都情不自禁地随着节奏击掌，场面极其热烈……当领唱的“老码子”夏克云咏叹之后放声高歌，轻松划过high C，声冲云天，令一些专程来观摩号子的歌唱家都瞠目结舌！

媒体纷纷报道。《文汇报》刊登了号子的全部唱本与编创体会，电台、电视台、唱片公司先后邀请录音、录像。码头号子很快引起海外的关注。美国耶鲁大学的历史博士专程赶来访问，向我了解号子的产生与码头工人的历史境遇。英国磐石电影制片厂的摄制组到港区拍摄码头号子的排练与演出。上海电影制片厂委派梁廷铎先生担任码头号子电影纪录片的导演。

正当梁导演决定为“老码子”补镶牙齿试镜的时候，传来北京密令，上影厂全线停产，集中力量赶拍《盛大的节日》。这是一部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电影。号子队被“请”出了摄影棚，空欢喜一场的“老码子”抱憾终生。



2012年码头号子队在巴西米达索市巡演

“养母”挺身来“领养”

20世纪末，浦东开发建设势如破竹。按照黄浦江两岸发展规划的要求，上海港码头先后迁出了黄浦江。上港七区也迁出塘桥社区，移到罗泾继续从事煤炭装卸作业。同时，港务局实行政企分开，体制改革。在这样的变动中，码头号子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事过境迁，三十多年过去了，唱号子的“老码子”大部分先后离世，唱号子的“小码子”也都一一退休，我也调出了上海港。记得号子队最后的盛大演出，是在1991年6月下旬，上海港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70周年的音乐舞蹈史诗《大江凯歌》中的激情展示。《文汇报》还在头版刊登演出广告，黄浦区体育馆是上海港号子队最后谢幕的舞台，有23个国家的港口代表团观赏了演出。当号子唱完最后一个音符，全场中外来宾起立鼓掌致敬。

码头号子远离了我的耳畔，深埋进我的心底……

2006年的一天下午，我忽然接到塘桥社区文化中心的电话，约我一起晚餐。餐桌上意外相遇两位老朋友：一位是一生从事民歌研究的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黄白，一位是热衷于搜集民族民间音乐的作曲家侯小声。原来，塘桥社区决定依靠专业力量拾起上海港码头号子，并准备将此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项目的发起者是塘桥社区文化中心工作的人员韩卫国先生，他是原上港七区工会的一位干事，二胡、板胡拉得很好，参加过码头号子的乐队伴奏，手上留存着号子的唱本总谱。老韩退休后应聘到塘桥社区文化中心从事群文工作，把上港七区号子队的作品移植到了塘桥社区。

激昂的码头号子又在我的心中响起！我向塘桥社区提供了号子队组建、创编、演出的所有情况，还把留存的有关珍贵图片全部奉献。

塘桥社区党工委领导高度重视码头号子的“申遗”工作，他们组建了专门普查小组，翻阅大量文史资料，并走访许多媒体，还走南闯北在江苏农村寻找到上港七区号子队仍健在的九十高龄“老码子”程年碗。在专家指导下，塘桥社区普查小组的工作人员还踏遍黄浦江两岸，挖掘整理了大量过去上港七区号子队未唱过的码头号子。在完成了一个艰辛的探寻过程之后，塘桥社区的上海港码头

号子“申遗”，终于在2006年、2007年、2008年连升三级，三年间通过了从浦东新区到上海市最后到国家专业机构审核考评，最终光荣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宝库！

按照“申遗”工作的要求，申报的项目不仅必备书面、音响资料，还要有具体的文化形态。而塘桥社区在上海港码头号子“申遗”工作开始之前的2005年，已从社区合唱团中挑选十来位形象好、声音亮的男演员，组建了一支塘桥社区号子队。这支号子队的成员中只有一位上港四区的退休工人，其他都是别的行业的退休人员。

自然，这些“外行”学唱码头号子并不容易。尽管他们大都识谱，但是要唱出谱上无法标识的情绪、气质是需要体验的。于是，他们去请教在海港工作的退休工人，体会码头装卸的繁重与艰辛，并刻苦练唱，逐步进入神似的艺术境界。号子队先在社区演出一炮打响，然后在浦东新区与上海市级文艺汇演连连获胜。

2010年，号子队光荣地代表上海参加全国原生态民歌演唱大赛，荣获全国大赛第二名。塘桥社区号子队，在“申遗”前后连演200多场，媒体报道、电台录音、电视录像，忙得不亦乐乎。

去年11月6日，他们还应邀到东方艺术中心歌剧院演出，主办方是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遗憾的是，码头号子的“产地”上海港已经没有码头号子了，要听“自家的号子”还得外请，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号子队队员有点诚惶诚恐，认为这场演出是“关公面前舞大刀”，不知反响会如何？他们没想到，在全场12个节目中，码头号子风头最健，从出场到结束，掌声此起彼伏，热烈非凡。也许正因为是在“产地”演出，才会有如此强烈的共鸣吧！

塘桥社区的号子队还走进高等学府的礼堂，登上国际文化的论坛，他们的唱本还成了区域性中学的音乐教材。在流行音乐与轻歌曼舞相伴的舞台上，码头号子的声浪爆发，如异峰突起，石破天惊，不仅赋予日趋阴柔的舞台以阳刚的壮实，而且给物欲横流的社会以惊醒。码头号子所显现的自食其力、刻苦负重、勇于担当的精神及其步调一致的坚持，为观众高度认可，也为当今社会所必须。

走出国门惊世界

2011年4月，号子队接到去德国参加国际民间艺术交流演出的通知，但限于名额，号子队只能派部分队员出访。队员王志强列入出访名单，他欣喜若狂，回到家里放声练唱，声震邻里。妻子说：“你有精神病啊！”

2011年7月，号子队在德国分别参加了“2011年第九届露莎提亚国际民间艺术节”和“贝克国家民俗节”，码头号子唱响了包岑与谢瑟尔。德国观众惊呼：“太震撼了！”当地“粉丝”跟踪号子队，看了一场又一场，“CHINA! SHANG-HAI! TANGQIAO! OK! OK!”赞叹不绝于耳。德国萨克森周报、包岑报等媒体做大篇幅报道，柏林广播台录制了“上海港码头号子”专题节目实况播出，DRM电视台也作了专题录像报道。

2012年6月，号子队又出访巴西，参加“马托格所州民间艺术节”。在卡塞雷斯市主舞台与卡塞雷斯州大学城、米达索市·迪欧斯特小镇一共演出7场，同台演出的还有巴西、智利、乌拉圭、斯洛文尼亚的艺术团队。这些国家的代表队

都是表演民族歌舞，演员主体是青年男女，唯有中国队的演员都是老年人。除了号子，塘桥社区还带去了舞龙、扯铃、秧歌等，所以卡塞雷斯市市长称赞：“中国老头老太能有这样的状态演出，说明中国人的生活是幸福的。”

让队员们难忘的是，当他们行进在卡塞雷斯市的大街，不断被街道两边欢呼的市民所拦截，他们一边走一边表演，短短一站公交车的路程竟走了一个半小时。许多巴西青年手举着自己手绘的纸质五星红旗使劲摇动，高呼“CHINA! CHINA!”当他们看到队员们手上的布质五星红旗，纷纷涌上来用纸质五星红旗换布质五星红旗，然后高高举起。看到自己可爱的祖国在异国他乡被世界托举，队员们激动得泪流满面，连声高呼“中国万岁！”

汉朝的刘安在他的《淮南子》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码头号子游走世界、震撼海内外的艺术实践又一次证明了一个最朴实的真理：艺术起源于劳动，而劳动最光荣！



1972年上港七区码头号子队的演出剧照